



【域外走笔】

所谓大学

□许志杰

日本京都有一个东寺，每月的第一个周日被定为“骨董市”，就是中国的文化市场之类的集市，如北京的潘家园、济南的英雄山文化市场，差别就在于东寺只有月初的第一个礼拜天才有。这一天正好被我赶上，买了几件自己喜欢的小玩意儿。最中意和高兴的是淘到一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索引。品相极好，价格合理，摊主还附送了一本字帖和漫画书。我很高兴，爱屋及乌，一下子就产生了去京都大学看看的想法。

第二天，有点小雨，云雾缭绕，一个迷人的京都秋日，我走进京都大学。依照中国人对大学的传统认识，大学是要有个正门的，门不正则名不顺。的确，京都大学不像欧美的大学那样完全敞开式的，而是如中国的大学模样，每个院落都有围墙与外界相隔，每个校园都有一个大门，一个象征性的门，就是为了方便出入和便于管理。之前，对京都大学了解不多，中国人更多的是知道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虽然在日本排名贵为老二，仅次于东京大学，也有说法是与东京大学齐名，只是侧重点不同。东京大学更多的是培养治国理政的政才，而京都大学则在科学领域培养了大批精英之才，被称为日本科学家的摇篮。“二战”之后日本的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来自京都大学理学部，名字叫汤川秀树，获得物理学奖。此后又有9位京都大学教授先后获得诺奖。很遗憾，京都大学并没有因为获得如此巨大的科学成就而受青睐，总感觉与我们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的眼界和心气尚有差距。这些年京都大学的世界排名乃至在亚洲各大学中也不显眼。对习惯了以排名论短长的我们来说，京都大学的确难以进入视野。

先来到的是京都大学北校园，以日文中夹杂着的汉字看，这里包括理学部、农学部，还有一个农场和马场。马场里边养了几匹马，场外还张贴了招募驯马的学生和对外进行马术训练的广告。理学部的楼前挂了一些挺高端的单位牌匾，物理、化学、数学实验室都有。说不定这几座低矮的楼里就会走出诺贝尔奖获得者，此前获得诺奖的京大教授中以物理学和化学居多。我驻足楼前，很久却没有人从中走出，校园寂静如夜，除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打在树叶上的声音，楼里楼外都非常安静。偶有几个年轻学子走过，脚步匆匆，没有留下一丝喧嚣。或许这才是一个大学校园应有的安静。

因《甲骨文字》一书而生拜访京都大学之趣，加上专业所向，就想看看学校的人文科学大楼。根据我的记忆，读大学时有一位来自京都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曾经给我们做了一次学术报告。具体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主持此次学术报告的老师讲，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学的研究非常深入，无论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还是取得的学术成果，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我们。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事，对外毫无所知的

大学生，当时听了有点蒙，内心深处还有点不太服气的那种憋屈。这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索引，出版于1968年，从本书编者贝塚茂树的前言看，之前已经有《甲骨文》图版册和甲骨文论文集出版。甲骨文出自中国，发现者也是中国人。京都大学贝塚茂树先生整理出版此书，虽然远离甲骨文之乡，亦当是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

由北院出来，沿一条静谧的小路往西行，一片住宅区就在眼前，很密，各富特色，无法确定是不是教师宿舍。从优雅的样子和花团锦簇的院外装点来看，应该是一群兴趣广泛的雅士在此居住。西校园是京都大学的本部校区，学校行政机构及人文科学各学部、工学部都在这个校园。从这片住宅区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西校园。首先找到人文科学的教学楼，想进去参观却吃了闭门羹。这才发现京都大学每一座教学楼的大门都有铁将军看守，进出人员需要刷脸或者识别指纹，外人不能随便出入。这样“未经允许，不得入内”的大学教学楼在欧美的大学里是常态，这样可以很好地保持教学楼里的秩序。相比之下，国内大学的教学楼进出似乎有点过于随意，一般是大门洞开，出入自由，显得有点乱。

教学楼“闲人不得入内”，只好在校园观花。蒙蒙细雨中，朴实无华的校园环境和相貌平平的校舍建筑，没有给我留下多少惊艳之印象，校园的绿化建设似也没有多少章法。在这点上，既不像欧美老牌大学校园那样，有大片绿茵茵的草坪、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庄重古朴的校园建筑；也不如现在中国大学校园那么注重花草草的种植，路边人行道花砖铺设讲究，校园建筑物高大上。的确很具日本特色，拙而实用，低调稳重，寻不到一丝拥有数位诺奖获得者的澎湃与喜悦，更没有趾高气扬的炫耀。

快要离开时，终于看到了京都大学的正门。这个坐北朝南的校门，同样很低调，“京都大学”几个汉字镶嵌在一道不足两米高的墙上，很不显眼。与国内一些气派的大学校门相比，京都大学这样低调的校门，可能也正是其人文精神之所在。

正午时分，在附近的一处拉面馆用餐。十分拥挤的店里坐着正在等餐的食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一脸稚气的年轻人。我猜想，他们大概都是京都大学的教授或者学生。一碗清淡的拉面，每份730日元，就这样，十分简单。

回国后拟了一些与日本三周之行相关的写作题目，唯独忘记了曾经走进的京都大学。恰巧本年度诺贝尔医学奖揭晓，来自京都大学的教授本庶佑名列其中。于是，记下这些文字。想起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1931年说过的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看上去，建校于1897年的京都大学比较符合梅校长的愿景。

（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知名专栏作者）

老友李兄的传媒公司搞中小学生作文比赛，颁奖的时候想请我到场讲几句。我不惯抛头露面，加之上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一句话能毒死一个连”，所以，即使为老友的生意计，也该敬谢不敏。怎奈李兄意颇坚决，最后我提出“要讲就只能按我的意思讲”，李兄颇爽快，一口答应。

地点设在一家书店的二楼。我到的时候，已经颁奖完毕，一屋子人静等聆听我的“高见”。噼里啪啦一阵掌声后，我的讲话开始。我回忆起小时候写得最多的作文题是“我爱我的家乡”，我说这样的作文题现在看来很成问题，因为它把那些不爱自己家乡的人的表达真实感情的权利剥夺了。如果允许讲实话，在我们那旮旯，乡人之所以还算重视孩子的教育，还不是希望有一天能离开这个“鬼地方”……我正得意忘形地侃侃而谈，主持人李兄克制而礼貌地打断我——他的脸色这时已只好用“铁青”来形容。我这才想起曾被交代过，他们此次作文比赛的主题是“我爱我家”，而“爱家乡”无疑是“我爱我家”的题中之义。我这不等于一上来就把人家的征文主题给否定了？好在有李兄打圆场，“丁教授所讲跟我们这次征文主题并不矛盾，爱家乡有各种方式，批评家乡也是爱家乡的一种表现”云云。我顿时对我这位老友佩服得五体投地，应变能力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强了？

更大的麻烦出在提问环节。有学生家长问：您对学生读课外书怎么看？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读什么书！多做数学题！”作为此次活动的合作方，漂亮的书店女老板这时表情已然很不好看，但是老天做证，我跟女儿也是这么讲的。我喜用极端化的表达，很平正的“阅读不可耽误功课”到了我的口中就成了“读什么书！多做数学题”。极端化表达的缺点是刺耳，优点是暴露一些不为人注意的问题——考虑到越来越激烈的学业竞争环境，读书固然好，却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很多家庭的不能承受之重？也许是受我这个父亲影响的缘故吧，女儿自小酷爱阅读，可这竟成了我们夫妻的一块心病。我夫人的话可能太直接了些：你将来做教师、做律师、做医生，喜欢读书谁也不会说什么；若你将来在菜场卖菜，难道也有时间让你手里随时捧一本书？我们夫妻难得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现在不让她或少让她看书，正是为了她长大成年后能拥有一个可以自由享受阅读的体面生活。我们现在要女儿克制阅读

的欲望，把精力集中于课业，就是因为“希望她将来能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又有小学生问：写好作文必须要经常积累好词好句吗？这个问题勾起了我非常不愉快的回忆。女儿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回老师布置的作文题是《第一次给妈妈洗脚》。从来没有给她妈妈洗过脚的女儿，为了完成这篇作文，第一次给她妈妈洗脚，然后如实记下了“给妈妈洗脚”的全过程，包括她妈妈催她快点，说“我还要去洗碗、拖地呢”。女儿的作文在我这里通过了，在老师那里却被判为“不合格”，撕掉重写。我问女儿，别人都怎么写的？女儿给我举了个例子，给妈妈洗完脚后，很多同学会写“妈妈脸上的笑容比彩虹还美”。天啊，写下这句话的孩子见过彩虹吗？不要说小孩子，我活了快五十岁了，我们小时候的空气质量也非现在可比，然而在我的印象中也未见几次彩虹。显然，这样的句子来自所谓“好词好句”。我知道，现在很多语文老师以及作文培训机构都把平时积累好词好句作为写好作文的秘密武器，好像学生写不好作文就是因为头脑中好词好句太少。这就把病源给诊断错了。在我看来，写好作文不需要什么“好词好句”啊，小孩子妙语天然，随口而出就是妙文，关键在于要真正给他们自由。

阿城的《孩子王》中，穷孩子王福的作文《我的父亲》这样写道：“我的父亲是世界上力气最大的人。他在队里扛麻袋，别人都比不过他。我的父亲又是世界上吃饭最多的人。家里的饭，都是母亲先让他吃饱。这很对，因为父亲要做工。每月拿钱来养活一家人。但是父亲说：‘我没有王福力气大，因为王福在识字。’父亲是一个不能讲话的人，但我懂他的意思。队上有人欺负他，我明白。所以我要好好学文化，替他说话。”这样的让人动容的作文需要什么好词好句呢？我本还想继续说下去，突然想到此次比赛的承办方就是某作文培训机构，获奖学生也多是这个机构的学员，而他们的老总此时就坐在门边，至于脸上的表情怎样，老实说我根本没敢看。

果然是“露多大脸”，就“现多大眼”啊！事情过去不到三天，就有一段题为《丁辉副教授砸场记》的“仿评书体”在微信朋友圈流传。我这样的人，就该从各种“场面”上永久性撤退，躲进书斋成一统，于自他两利。这篇小文是自诚，也是自勉。

（本文作者为江苏宿迁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生活直击】

『砸场』记

□丁辉